

关于饥饿的记忆

那一年,在外地工作的远房叔叔,来到了村里,给我们每个小孩发了一块糖。我在此前只是用舌头舔过白砂糖,从没有吃过块糖,我们山村里的供销社也没有供应过这稀罕的东西。不小心,也是没有经验,我把这块糖吃到了气管里去了。据后来大人说当时我憋得全身发紫,再后来不知大人用什么办法取出了这块糖。这一年对我很重要,如果这块糖不能及时地取出来,我今后的哪一年就都没有了。糖果对乡下的孩子是很有诱惑的奢侈品,尤其是棒棒糖。我在今年之前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,今年,也就是我40岁的年份,两个儿子要吃棒棒糖,我买了三个,给自己也买了一个,40岁第一次吃棒棒糖,真甜。

那一年的一天傍晚,村口土坡上一队年轻人又是敲锣打鼓,又是喊叫。原来村里装了大喇叭,代替了人的喊声。但大喇叭里讲的话我听不懂。父亲告诉我,我们讲的是土话,大喇叭里讲的是普通话。听得多了,慢慢就听懂了。这一年很重要,我从此有机会听普通话了,也是转折性的一年,如果这村里的大喇叭要晚安几年,我的普通话会更差。我工作后积累的第一笔钱,就是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。从那以后,我的过年标志就是回到老家,在西北的热炕上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,一年都没有落下。

有一年我在海口,没有路费回家。腊月三十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,街上的餐馆都早早关门回家准备自家的年夜饭去了,我与当时我的同事和朋友祝军好不容易才



名人博客

新浪网博客频道

北京燕山出版社友情推荐

本书是从各行各业名人的网络日记中精选的性情文字,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人生中诸多现实而永恒的话题。脱下明星的包装,走出名人的光环,卸下智者的头衔,也许,只有在日记中,“平凡人”的角色才能得到真实的还原——至少,是相对的真实……

伍

找到一个大排档,我们俩一边吃着河粉,一边盘算着这年怎么过。祝军建议说,干脆我们俩爬火车,不花一分钱,看能不能到我们各自的老家,天水 and 南京。我没有同意,我想北方的天气太冷了,这没把握的事要搞不好,会冻死在货车厢里。祝军最后说要去儋县的热带作物学院去看他的女朋友,因为她晕车不能来海口。晚上祝军骑上自行车走了,从海口到儋县的距离是170多里,当时

还没有高速公路。

送走了祝军,我想要把自己的除夕夜安排好。我与我住的招待所二层的女服务员谈好,晚上在她的值班室看那台黑白电视。但看节目看到晚上9点,服务员说她要睡觉,不让我看了。我只好出来,自己一个人过了一个最孤独的除夕夜。

过了这孤独的除夕夜,时间到了1990年,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年。海南建省的热潮过去了,经济停摆了,凑热闹的那拨人离开了。我当时管理着一个砖厂,砖是一块也卖不出去。砖厂的民工走得不到100人了,他们都是拿计件工资,没有活干,他们也就没有任何收入。我走到民工的工棚里,问他们上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,有人说是昨天,有人说是前天。饿着肚子的民工,静静地躺在那里。这是我度过的最低潮的一年,在这一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生机。

也是这一年,经易小迪的推荐,我当上了海南省佛学会的秘书长,在一个无聊的年份,清淡一些有聊的话题和闲事。接下来,我在匆忙和热闹中度过了几年。突然,有一天想起祝军,从朋友那里打听到,他已出家了。随后的几年中,我常常想起与祝军在海上共同度过那困难的岁月,也正是因为有一批像祝军这样的朋友,精神上才感到很充实。又过了几年,突然,有一天接到祝军的电话,说要看我,我很高兴。见面后,祝军告诉我,不回家了,现在在搞IT,并告诉我他的孩子已经和我的办公桌一样高了。

潘石屹/文 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联席总裁

在路上

长征一开始,多数是夜行军。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飞机的袭击,队伍出发后一连数日晓宿夜行。杨成武在《忆长征》里有一段很有文学色彩的描写:“队伍隐在山影里,看不到一点行迹。偶尔能听到草鞋踩在石子路面上的响声,风从林梢上吹过,发出像大海接近平潮时那种节奏缓慢的低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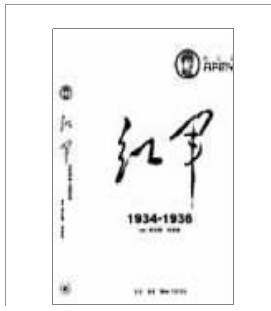
这可是一支长达几十里的队伍,在现在人看来,这样的旅行似乎很有浪漫气息,事实上并不如此。日夜颠倒,有的战士睡眠不足,甚至走着走着就靠在山道边睡过去了,而后面的战士也机械地跟着打起睡来,把队伍落下一大截,直到有清醒的战士发现了,才又匆忙地追赶大队伍。

“当月亮被云遮住,部队就要燃起火把行军。这种火把通常是一束劈开后又捆扎起来的竹子。有时还用松枝,还有盛满了煤油的竹筒。这时,无论是从山脚下仰视,还是从山崖俯视这条忽隐忽现、逶迤盘旋的火龙,那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。但是,行军并不都是那么轻松美妙的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,战士们有时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条子,好让后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来。有时在危险的小山路上夜行军,后面的同志要将双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,以防偏离那条狭窄的小道。这些小道经常是很滑的,如果一个人摔倒了,后面跟着的一班人也会摔倒,搞不好,有时还会从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。”美国记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在自己的著作《长征:前所未闻的故事》这样描述。

纪实文学

师永刚 刘琼雄 著

三联书店友情推荐



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。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行程,到达陕北。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。本书以关注细节、散点式记录方式为主,涉及了许多以往未曾涉及、关注的内容,诸如红军长征食谱、长征时用过的器物、红军病历、长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,长征的参加者以及长征中流散各地的红军士兵的命运,等等。

虽然红军还不知道要去向何方,但因为长征初期部队还行军在苏区的范围内,心情都还平静,特别是夜间行军倒也并不枯燥。一位红军干部后来曾告诉美国记者史沫莱特:“如果皓月当空,轻风拂面,夜行军也是很惬意的事,要是附近没有敌军,各个连队之间还要拉歌呢。”

1934-1935年的中国,似乎特别多雨。红军沿途都是在暴雨泥泞中的山路上艰难前进,经常摔跤。萧锋在日记里

介绍对象

钟庆东是下定决心向他的高中时代做彻底告别的,然而秋天的时候,他还是不得不接受父母苦口婆心的劝告,在高三复读一年,来年重新报考美术院校。

这一年,他的母亲患了严重的冠心病,任何一点感情上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给她带来失去生命的代价。钟庆东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丝的马虎,他最终答应了母亲,复读一年。

钟庆东来到了县城的重点高中,也就是他当初进入职业高中时,偶尔带着一点说不清的眼光打量着的那所高中。反正,钟庆东现在需要用力提高的是他的文化课分数(他自认为是这样)。美术上可以自修,所以,重点高中不开设美术班对他来讲那真是无足轻重的事。

一年的时间,不过就是从秋天经历了一个寒假,连第二年的暑假都没来得及迎接,就将过去了。钟庆东进行了他生命中的第二次应考,果然,命运给了他去年完全不同的一份礼物。是的,他去年应考的成绩是美术差了八分,文化课差了二十二分,而今年则是完全得到了扭转:美术差了二十二分,文化课差了八分!

命运这种巧得不能再巧的捉弄方式令钟庆东恼怒至极。他记得以前读过瑞士著名哲学家荣格的一句话:“恼怒是意味着你还没有看到在它后面是什么东西。”一个人受到打击可以忍受,难以忍受的是这种打击融入了轻佻的偶然性。钟庆东当时就下定决心不再考了,他实在懒得设想再复读一年后的考试结果会是怎样一番景



都市小说

于晓威著

收获杂志友情推荐

高中三年,钟庆东一直专心暗恋着同班的美女罗小云。罗小云幸运考取外地一所大专院校,钟庆东高考失败,自此两人断了联系。时光流转,他们再次相遇,半年后,他们结婚了。可是,他们的婚姻似乎验证了一句名言:无论你结婚还是不结婚,你都将为之后悔……

象。促使他下定决心的因素自然还有一个,那就是他母亲的病情近一年来渐有好转,完全可以经得起钟庆东天马行空和独断专行的一切行为的折腾了。

天气渐渐冷下来的时候,钟庆东所在的县城按上级要求进行冬季义务征兵,他想也没有多想,报名后顺利地来到了军营。

钟庆东接到他母亲的来信。母亲在来信中第一次提到有人要为他介绍对象的事。这个时候,钟庆东已经在

远离家乡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某驻军部队当了快一年兵了。母亲在来信中说,按她的本意,她是不太想让钟庆东这么早就考虑婚事的,但是介绍的人说,那个姑娘是很好的一个人,好姑娘是不等人的,你不和她相对象自然会有别的人和她相对象。母亲希望她利用探亲假回来一次。如果双方都看着满意,彼此再分开也就放心。

钟庆东这个时候在部队团政治处的宣传股里做事。他在新兵连呆了三个月,然后就来到这里。在部队里,他没想到高中学历几乎是最高学历(他有时候好笑地想,自己比别的高中学历还要高一点,因为他在高三多念了一年),更重要的,他的美术专长让他找到了用武之地,团领导很赏识他,很快调他来政治处搞宣传,写写画画,兼放幻灯和电影。

母亲的来信给他这种惯性的自由点了一脚刹车。钟庆东仔细想了三天,他最初想的不是回不回去的问题,而是母亲怎么会给他来这么一封信的问题。在他看来,一个男人找对象还要别人介绍,这算是一个无能的体现。

母亲给他的来信中,并没有夹带对方的照片,这就不能不让钟庆东接下来产生另一个想法。一个好的姑娘,钟庆东想,好姑娘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?他不知道。这种无知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他的好奇。事实上,钟庆东当兵近一年来也常常感到寂寞和单调,钟庆东算了一下自己的年龄,二十岁。二十岁的时候,有人要送给他一个姑娘。这意味着他可以拥有她,同时,也被她拥有。钟庆东想,也许我真的应该回去见一见她。

两具尸体

工人们纷纷大嚷:“有尸体,有尸体,还是无头的。”我与小黄相视一眼,白铃的尸体终于出现了。走到近处一看,在一个半截水缸里蜷着一具无头尸,水缸应该是张宅厨房里的,就是不知道当初段瑜怎么会挖到这里,将白铃的尸体埋下。

小黄打电话通知要好的警察,我吩咐民工将水缸和尸体附近空出来,继续往下挖,既然厨房露出来,那么地下室也不会远了。果然很快地,听到镐、锄等工具撞到石板的声音。大家纷纷叫嚷:“挖到了,挖到了。”

我走近,满怀紧张地看着大伙儿将石板撬开。撬开第一块石板时,一股恶臭蹿了出来,本来围着大伙儿纷纷捂鼻退后。“继续把石板撬开呀。”我捂着鼻子说。那几个民工愁眉苦脸地相视了一眼,无可奈何,继续举了锄头撬石板。一块又一块,忽然撬石板的民工停住了手中的动作,发出惊讶的声音:“咦,里面有人!”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,地下三尺,怎么可能呀?大家纷纷将脑袋凑近坑边细看。我心中一动,拨开攒动的人群,挤到中心低头一看,黑沉沉的地下室里一颗白发苍苍的脑袋,煞是醒目。

真的是人,全场哗然。这般的喧闹,那颗人头却一动不动。我感到不安。这时眼睛适应了黑暗,看清楚地下室里的部分情况。那人蜷成一团,躺在桌子上,像极了平时躺在垃圾堆附近的流浪老人,甚至更糟。

民工们加紧撬石板。无限天光照亮了地下室每处,于是所有的人都厌恶地连退了三

悬疑小说

若花燃燃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

大一新生叶浅翠在暑期旅行时遭遇诡异的事情,误入雾宅,亲眼目睹一件杀人案。但是她所指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宅子,连她在雾宅里的同伴魏烈也否认认识她。这令对浅翠心有好奇的心理学的研究生陆林都开始怀疑她的神志。事情很快飞转直下,公安局的机密卷宗揭示一年前确实发生一起杀人案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

步,又好奇地捂着鼻子张望。下面的光景实在是糟糕,不是找不着言辞来形容,而是描述都觉得恶心,能做的就是尽量不想它。

大家眼巴巴地看着我等待指示,我犹豫再三,一咬牙强迫恶心跳了进去。一脚踩在一坨黑黄黏状东西上,尽管我已避免想它是什么东西,可胃还是神经质地收缩。走到桌子边不过几步,却是我一生中最为艰苦的行走。这时我已经看清楚桌子上的人,除了白发,她身上全是黑糊糊的。穿的衣

就写道:“战士们捧得像泥鳅似的”。董小鹏则记载:“整天在泥巴里过活的两只脚,洗也洗不干净(也没时间洗),已成了褐黄的颜色。”这种情况在进入“天无三日晴,地无三尺平”的贵州省境内就更是常事了。

长征初期,除了少数的红军将领,大多数红军战士都对长征的道路和目的地一无所知。许多红军包括邓小平在后来回忆时,都说自己的想法就是“跟着前面的人走就行”。

随着时间推移,战士们对漫长的行军养成习惯,“在路上”日渐成为常态,这时红军的军旅生活也形成了规律。戴正启15岁的时候参加长征,先是一个宣传员,不久就改做了卫生员,作为一名普通战士,他对红军生活的每一步、每一个细节都记忆清晰。1984年据他对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作者斯诺这样回忆:正常情况下,红军每天的生活伴随着清晨哨音一响而开始——一般是早上6点吹哨,但也常常5点或4点吹哨。起床后用15分钟时间整理行装,归还从农民那里借来搭床铺的木板、门板和稻草,再用15分钟洗脸、刷牙(当然并非所有的战士都刷牙)、吃早饭(4两米饭,有时是红薯)、领干粮、整队。有时先头部队领完干粮,米桶就见底了,其他人什么也领不到了。行军中平均每人负重约25斤。早晨出发前会通知当天的路程。白天休息两次:上午休息一次10分钟,午饭时间20分钟。没有午睡。如果遇到敌机空袭,大家就都可以乘机休息一下。趴在路边,等候哨音再一次吹响。

服,假如还能称为衣服的话,与身体浑然一色。她的脚边有一条破被子,或者也可称为破棉絮。一只手搭在桌子上,黑瘦枯干,像一个大大的问号。是我言语贫瘠,难以言明眼前的境况。脏乱恶心都不足以形容,几十万个惨字也许能概括一二。

我心里又恶心又难过。不论张盈曾经做过什么,所受的惩罚都太毒了。在一个黑暗的地下室里,她孤寂地生活了四十二年。难以想象,她怎么活下来的?为什么不自杀?她曾在叶浅翠的意识里出现,素衣长裙,苍白唇色,姿态婀娜。那是她在张宅里的姿态吧,大家闺秀的模样儿,却不料沦落至斯。

我试探性地伸出手推她,还未触及,一条小小的影子晃过,跟着手指一阵剧痛。我飞快地缩回手,只见眼前,她的肩膀上站了一只小白鼠,冲着我吱吱地大叫着。然后从破棉絮里,她的身下又钻出七八只老鼠,冲我吱吱大叫,充满敌意。

上面围观的人全看呆了,他们几乎见过老鼠如此嚣张。我努力地向它们传达我没有敌意的眼神,这样子默默对峙了几分钟,后来也许它们看懂了,叫声低了下去,恋恋地看了张盈一眼,退到桌子一边站着。

我的一只手指刚才已被咬伤了,钻心地疼痛。我再次伸出了手轻轻地推她,人手冰凉僵硬,她已经死了。不知为何,我长松了一口气。旁边的老鼠们吱吱而叫,低低的,像是哀鸣。

大家把我从下面拉上来,我一屁股坐在砍倒的树干上,仰头看着碧蓝的天空,不知为何,那深深的蓝竟叫我有种流涕的冲动。而现场民工们的议论声悉数离我好远。